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著名的“十大政策”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主编 张桂山



中共党史出版社

著名的“十大政策”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主编：张桂山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主 编：张桂山

副主编：赵晓红 刘秉政

编 辑：刘崇明 吴晓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刘志丹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谢子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习仲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南梁荔园堡



习仲勋题名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陕甘边区革命
委员会条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



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毛泽东为刘志丹烈士题词



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题词

仲勋同志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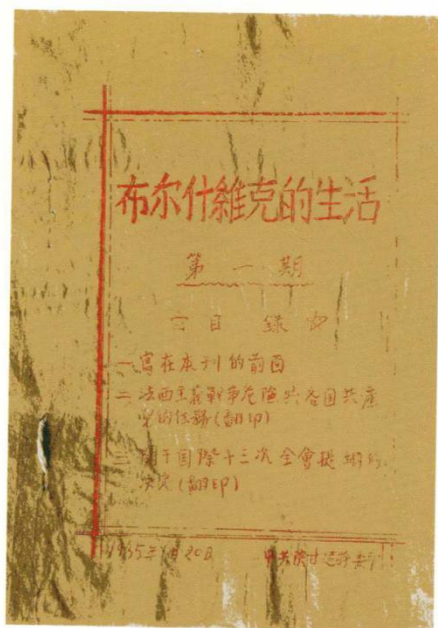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题词



寨子湾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陕甘边区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创办的刊物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的
刊物《红色西北》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发行的贰角油布币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农民
合作银行发行的贰角兑换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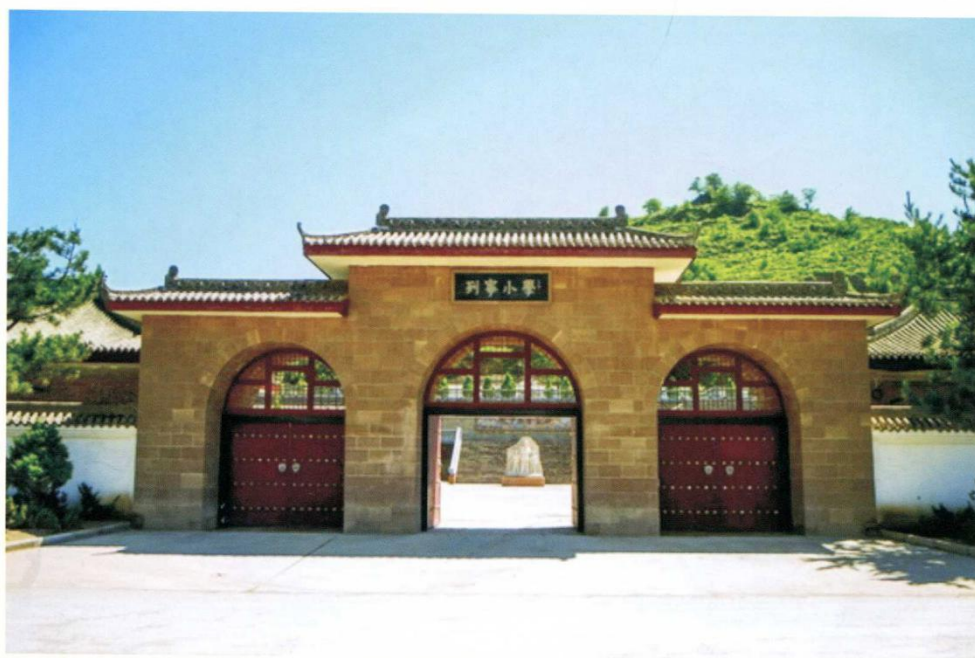
位于油坊沟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制币厂旧址



华池县豹子川张岔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旧址



列宁小学课本



列宁小学旧址

前 言

在即将迎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80 周年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由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撰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解读和探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历史建树的普及性党史读物，是研究和宣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项新成果，是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教材，也是学习和弘扬南梁精神的实践范本。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领导陕甘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之后，陕甘边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相互配合，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陕甘根据地继而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即：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廉政政策、各项社会政策等。“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自觉克服“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坚持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宪法大纲、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决定等精神，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十大政策”的实施，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创造了条件，解决了边区群众期盼已久的土地要求和吃饭穿衣等问题，有效改善了边区经济凋敝、文化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保障和促进了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繁荣稳定，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的成功实施，是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党政军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娃娃主席”习仲勋政治才华的充分展示，为习仲勋以后的革命生涯积累了宝贵经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无疑是习仲勋后来领导广东改革开放、创建经济特区的发端和缩影，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深远影响。

革命是为了建设，改革是为了发展。今天，我们搞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更加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弘扬南梁精神，深入扎实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为庆阳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当前，庆阳老区正处在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和负重爬坡期，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庆阳，是全市人民共同的梦想。中共庆阳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已为我们绘制出美好宏伟的蓝图。发展的目标已定，人民的期盼迫切。我们要大力发扬南梁政府实事求是、执政为民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自觉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十大政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精神动力，不断以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履行新使命，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实现新跨越，以面向群众、造福人民的时

代要求创造新业绩，把庆阳丰富厚重的党史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庆阳。

编 者

2014 年 7 月

目 录

概述.....	1
“十大政策”基本内容.....	17
一、土地政策.....	19
二、财经粮食政策.....	22
三、军事政策.....	28
四、文化教育政策.....	34
五、统一战线政策.....	39
六、民政劳资政策.....	43
七、肃反政策.....	44
八、知识分子政策.....	45
九、廉政政策.....	46
十、各种社会政策.....	47
回忆文章摘编.....	49
习仲勋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十大政策”	49
王世泰回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十大政策”	54
张策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几项工作.....	57
刘景范谈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分配.....	59
吴岱峰谈苏币发行、红军干部学校.....	61
蔡子伟谈陕甘边苏区的政权建设和商贸政策.....	63

张文华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	71
王生金谈南梁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	74
宋飞谈红军干部学校	77
杨伯伦忆红军干部学校	78
高生荣谈苏区创建	80
王四海谈列宁小学	84

概 述

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带领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的劳苦大众，历经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而创建的。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蛤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和红军。同年6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全国存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从未丢失过的巩固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之后发展而成的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两次转移活动中心，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阶段。

二十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改造“绿林”武装等斗争形式，发展革命武装力量。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边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

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①在甘肃华池林锦庙会师。1932年1月会师部队在甘肃正宁月明塬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在正宁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一经成立，即投入到创建根据地的革命活动中。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以正宁寺村塬为活动中心，初创了包括甘肃正宁、宁县和陕西旬邑部分地区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区的首次实践，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诞生。1932年8月，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大举进攻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沦陷。

从1932年9月开始，刘志丹、习仲勋等又投身于创建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在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下，很快创建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同年4月，再次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职能部门，选举一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接着，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十六军发动群众，建立了照金、香山、芋园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进行土地改革，积极推行“坚持公买公卖、设立集市、保护商贩、实行禁烟、禁赌、放足”^②等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建设。1933年6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遭敌重兵围堵，几乎全军覆没。10月，照金苏区陷落。照金根据地虽然仅存在了6个多月时间，但它直接威胁国民党陕西省的统治中心，扩大了革命影响，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纠正了“左”

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斗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之后，党派遣习仲勋、张策等来到南梁地区，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斗地主、闹翻身，建立基层农民组织和红色政权。

1934年2月25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再次成立了根据地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1934年4月，根据地军民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很快发展到陕甘边界的保安、安塞、甘泉、富县、中部、宜君、旬邑、耀县、淳化、靖边、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部分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杨森、张邦英等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的工作计划，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七月决议》强调在抓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同年秋，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七月决议》精神，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等，习仲勋为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蔡子伟等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文件。经过集思广益，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选举办法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性，保证了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各方面代表100多人。刘志丹、习

仲勋、张秀山、杨森、马文瑞、惠子俊、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等领导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在历时 6 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政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分别作了关于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粮食委员长，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监察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高敏珍、张景文先后任妇女委员长，蔡子伟(后张文华)兼任政府秘书长。

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边金山任军委副主席，朱志清(朱紫卿)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梅生贵兼任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辖三个中队，共 100 余人。

11 月 7 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计 3000 余人。主席台上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红色巨幅会标，整个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先后讲话。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当日下午，在荔园堡马洼子台上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全副武装，接受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新阶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取得的伟大成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此前后，根据地所辖中宜、安塞、赤安、富西、富甘、肤施、靖边、定边、红泉、华池、庆北、合水、永红、赤水、新宁、新正等20多个县都相继建立起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扩展到2.3万平方公里。

1935年6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其鼎盛时期，陕甘根据地东临黄河，西接庆环，北起长城，南至淳耀，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人口逾100万，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1935年4月，陕甘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后，习仲勋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党政机关先后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和阎家湾。6月上旬，陕甘边区党政机关又迁至洛河川下寺湾。从此以后，下寺湾成为陕甘边苏区的中心。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瓦窑堡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将原来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划分为陕甘省、陕西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由西北办事处领导。原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由陕甘省领导。同月，中共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朱理治任省委书记，王生玉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至此，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时陕甘省下辖甘洛、富县、宜川、红泉、肤施、中宜、华池、庆北 8 个县，其中位于庆阳的是华池、庆北两县。1936 年 5 月，中共中央撤销陕甘省，设立陕甘宁省。陕甘宁省始辖赤安、三边、庆北、华池等老苏区县。6 月，随着红军西征的推进，陕甘宁省的范围扩大到 13 个县，在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豫旺、豫海、定边、安边、盐池等县恢复和建立了 11 个县级政权。其中陇东境内有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豫旺 7 县。7 月，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从吴起镇刘家渠（当时归华池县管辖）迁至环县河连湾。

①1931 年 5 月，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阎红彦、拓克宽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1931 年 9 月上旬，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保安、靖边、定边和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9 月日，晋西游击队收编了师储杰、杨琪、杨鼎三支保运武装，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也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2 页。

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到了 10 多里路外的南梁堡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老庄窠组境内），因此，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南梁政府”。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

在寨子湾，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大力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结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等实际情况，颁布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习仲勋曾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将“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党史专家学者在对陕甘边区经济社会进行研究后，将“十大政策”概括为：

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廉政政策、社会政策。“十大政策”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土地、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和各种社会政策等六个方面。

今天的党史专家学者对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当时条件下制定的“十大政策”发出了由衷的惊讶和赞叹！很难想象，如此全面完整、系统周密、开放创新而又切合实际的根据地建设政策就出自寨子湾窑洞的灯光里。在那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在寨子湾那简陋的窑洞里，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者的目光如此深邃，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完备进步，非常合乎陕甘边区实际。“十大政策”的实施，在陕甘边区取得了重大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保证了根据地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南梁地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及重要作用和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陕甘边苏区的土地革命是陕甘宁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初始探索阶段，是当时全国土地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群众起来分配地主土地，取消苛捐杂税，砸碎了这一地区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翻身作主的农民群众主动参加革命，拿起武器，勇敢投身到开辟苏区和反“围剿”斗争中去，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起来废除高利贷和债务，夺取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劳苦大众，并公审、惩处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广大贫苦农民由给地主当牛做马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成为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新人。土地革命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解放了苏区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活跃了苏区经济，边区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到1935年春，南梁根据

地户数已由六七百户发展到 1000 多户，人口约 6000 余人。南梁荔园堡一带原来只有 5 户农户，后来增加到 20 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充分说明根据地土地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

——实施粮食财政政策，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物质基础，也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相互配合而开展的。没有经济建设，武装斗争就没有财力支持，革命武装力量就不能存在发展，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得不到保障，根据地就得不到巩固。相反有了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才有保障，才能巩固政权，稳定人心。如果经济工作做不好，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陕甘边根据地抓住农业这一根本大计，把握贸易金融财政这一关键环节，使根据地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有力配合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习仲勋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兴办集市、发行货币、搞活贸易、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的各种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南梁一带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新气象，连国民党刊物都不能不感慨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①习仲勋等在陕甘边根据地实施的开放搞活政策及其显著成就，与时隔数十年后他领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一以贯之的方法思路 and 必然联系。正是陕甘边区的成功实践，使习仲勋形成了务实、开放、创新、亲民的工作风格，也正是党在陕甘边区乃至后来陕甘宁边区的成功执政实践，给了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勇气和目标。1979 年 4 月，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际，习仲勋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和建议：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散会后，邓小平同习仲勋谈话，话题

就是从陕甘宁边区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深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邓小平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②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搞活思路可以追溯到深处内陆、穿越历史的陕甘边区。

——实施机动灵活的军事政策，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提供军事保证。坚持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执政的一条根本经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过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武装斗争，终红于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与地方游击队、赤卫军相互配合，采取了长途奔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转入外线避敌锋芒、攻击敌人薄弱以及夜袭战、游击战、声东击西攻敌不备等战术，有效消灭了盘踞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武装，粉碎了国民党部队对根据地发动的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使根据地快速扩大，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到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时，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下辖3个主力团、1个抗日义勇军，共2000余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武器装备、军事素质和作战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坚强支柱。

——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达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目的，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陕甘边区革命实际的统战工作模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从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各种社会势力，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

略，开展了多方面、多形式的统战工作，开创了“红色”（建立革命武装）、“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三色”发展革命力量的统战模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加以改造利用。他们不仅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以及“绿林”武装、哥老会组织发展统战关系，也把国民党地方官员、士绅作为统战对象。由于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斗争环境下，区别对待土匪民团，对反动顽固的政治土匪坚决消灭，对同情支持革命的主动接触争取，既消灭了敌对势力，肃清了匪患，又团结了革命力量，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得以创建、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陕甘边根据地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经验。

——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摧毁了传统腐朽落后文化，丰富了根据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政治军事斗争复杂尖锐的环境中，从无到有、从开创到普及、由尝试到完善，逐步发展起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军政干部学校和列宁小学，发行报纸，广泛开展以“六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活动，破除陈规陋习，提倡移风易俗，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相对落后闭塞的陕甘高原树立起新风尚。陕甘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革命斗争的开展开辟了新的阵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提供了动力源泉，其卓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陇东乃至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为全国新文化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是陕甘边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的重要组织保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和政府的廉政工作，离不开健全的法制法规。陕甘边根

据地的革命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是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奉公的重要保证，可以减少直至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把干部战士廉洁当作头等大事，颁布和实施了《暂行条令十八条》、《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等法规条文，规范了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更是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模范执行党的纪律。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量发给，使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陕甘边根据地从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到各区、乡的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社会局面，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正是因为南梁政府树立起了清正廉洁的形象，才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壮大，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①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原载《政治旬刊》1935年11月，现载《志丹书库·刘志丹卷》第1251页。

②余玮：《邓小平与中国经济特区》，《甘肃党史工作》，2008年第4期，第78页。

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今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仍然有着深刻隽永的启示意义：

1. 坚持发展经济是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解放生产力；就是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都能过上民主、平等、公平、温饱的生活。党取得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了保持政权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要组织全体人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刘志丹曾经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只

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政府才能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福祉。

2. 坚持群众路线是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的基本内涵。陕甘边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和成功典范。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的模范执行者。毛泽东先后为刘志丹、谢子长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并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创造性地运用到群众工作当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形成了陕甘边区群众工作的基本观点和朴素的群众思想。这些观点既是对长期革命和建设活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群众思想、群众观点、群众工作的重要贡献，为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3. 坚持开放搞活是推动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陕甘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犬牙交错，经济关系密切，互补性也很强，边区的必需品需要从外边购进；边区生产的粮食、皮毛等土特产需要外销。因此，陕甘边区通过开放搞活发展经济，做到公私兼顾，互利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发展和壮大苏区经济基础，增强与国民党斗争的能力。陕甘边苏区的经济贸易政策对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4.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南梁政府的“十大政策”闪耀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芒。“十大政策”之所以能赢得陕甘边区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最终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根本原因是刘志丹、习仲勋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成功革命路子。如在土改工作中，边区政府从具体实际出发，通过制定符合各阶层要求的《土地决议案》等政策法规，极大地激发了陕甘边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热情，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针对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封闭的现状，边区政府建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商贩，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来做生意；发行货币，打破壁垒，建立了陕甘边苏区金融体系，赢得了金融战争的胜利；兴办学校，颁布禁烟、禁毒、放足条例，实行以“六劝”为内容的社会改造活动，使南梁地区“旧貌换新颜”，为巩固和发展“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勇于探索创新是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探索在陕甘边区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正确道路，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立建树和创造性贡献。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自觉抵制“左”倾错误的干扰，适时召开包家寨会议，确定了开创三路游击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政方略。包家寨会议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走向新胜利的重要转折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道路被总结为全国武装斗争史的陕甘模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具有探索性、开创性和前瞻性，使根据地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不仅重视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而且重用党外经济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他们除必要的政治教育外，还在物质上给予优厚待遇，工作上委以重任。并注意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培养边区自己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人才，为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史研究者指出，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的时期，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确实需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识。

6. 建设清廉政府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政之所存在得

民心，政之所去在失民心”，这是一条经过历史检验颠扑不破的真理。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关注民生，确保政府的清廉。在推行“十大政策”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建设清廉政府为目标，坚持节约，反对浪费，通过制定各类法规，规范干部战士行为，从而使节约之风在边区蔚然成风，形成了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廉洁政府的思想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只有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南梁那开放的集市、那粗糙的货币和那吸引外来商人的政策，才会真正理解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思路与内陆深处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边区以及陕甘宁边区都有不可割断的联系。目前，我们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南梁政府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模范实践者。在远离党中央、甚至一度 and 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正确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成功范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发动千百万农民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强调贫农是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

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扩大了土地没收的范围，规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纠正了关于在土地革命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同时，明确提出：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强调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对于

富农，则要根据它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凡富农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在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同时，应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以习仲勋为主席的南梁政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等法规，制定和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廉政政策、各种社会政策。“十大政策”的实施，推动了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党在陕甘边区局部执政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认真学习十大政策(绘画)

一、土地政策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共和国土地法令》

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包括：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绘画)

由于边区人口稀少，耕地较为充裕，政府在分配土地中实行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依需要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由于贫苦农民没有粮食下种，政府把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满足贫穷农民的迫切要求，调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等回来后再分给土地。



陕甘边区各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成立土地委员会(绘画)

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中心区域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各地互相调剂余缺。

为了使上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政策、法令，组织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先在阳坡头等乡村搞分配土地试点，接着在正宁县湫头区的西头、范家洼、南邑、吕家沟圈、洼坡岘、岘子等地开始分配土地。不久，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派出工作组在三嘉、长舌头区及湫头区各乡分配土地，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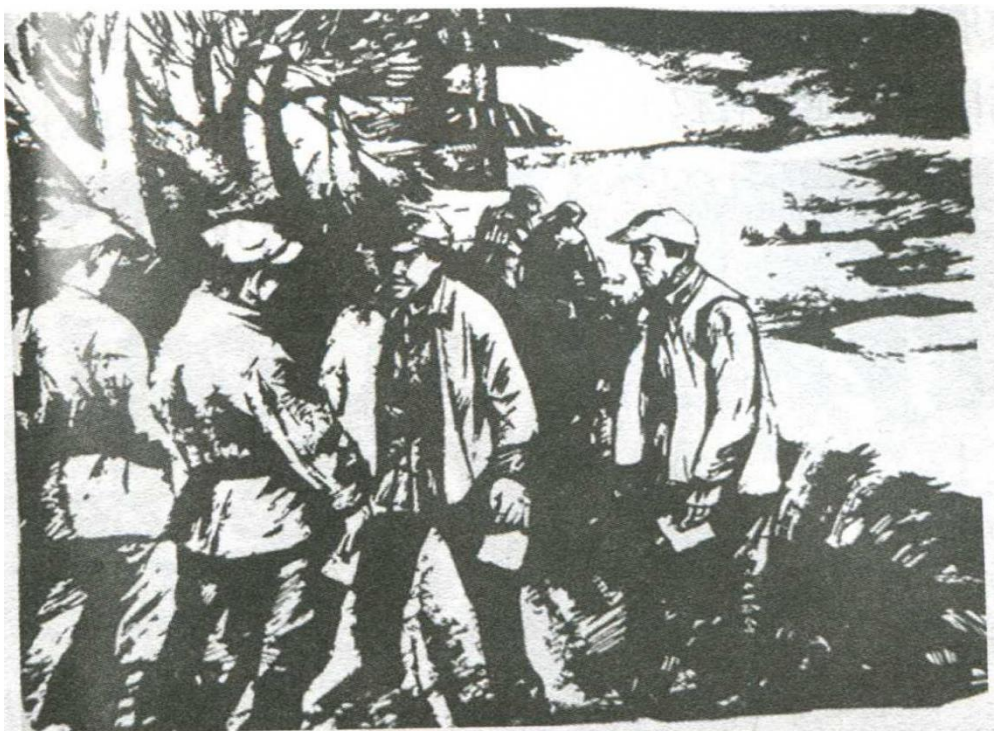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群众高兴地领取分配的粮食(绘画)

当时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开始时，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是张步清，他是横山县人，逃荒来南梁，本来家境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改变，开垦了大片荒地，还雇工耕种。此后，张步清对土地革命斗争不热心了，当刘志丹批评他时，他还辩解说：“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习仲勋说：“你不把土地委员长换了，看土地革命能搞下去吗？”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选派工作积极认真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使分配土地工作顺利开展。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习仲勋等领导人及时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制定并发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1936年，依据农户经济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

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份。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搞调查研究(绘画)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二、财经粮食政策

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其内容是：

设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边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繁荣苏区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生活。解决红军的军需供给。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人民生活。苏区政府的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或在市场购买。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不征粮。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正像当时参与南梁根据地建设的张策后来回忆的那样：“原

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①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



南梁地区活跃的集市(绘画)

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领导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它物资想办法运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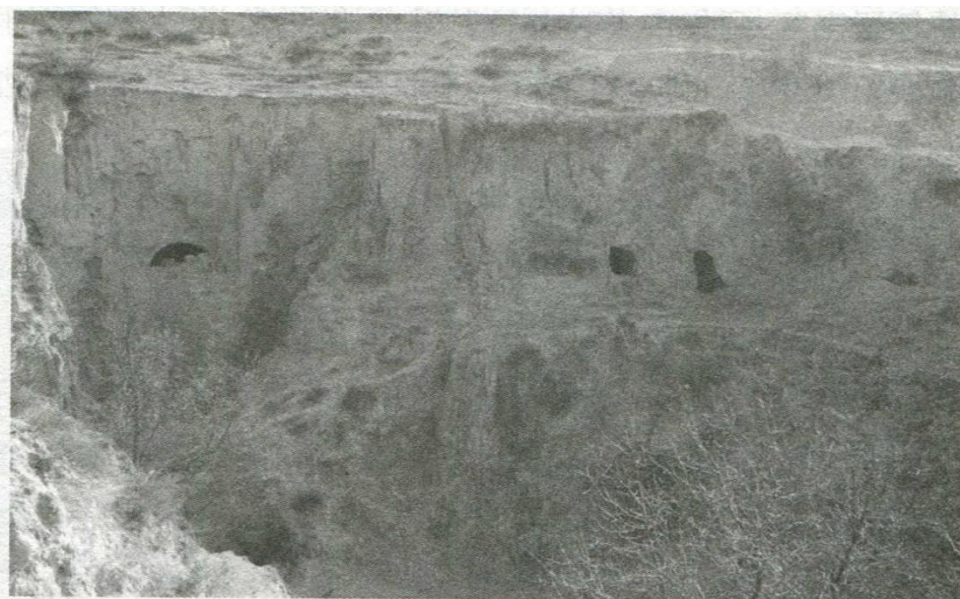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使用过的秤锤

当时,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白区来的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了战士不懂礼貌,告诉那个红军战士,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②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落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却慢慢清淡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③对此,习仲勋等高度重视,积极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习仲勋和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终于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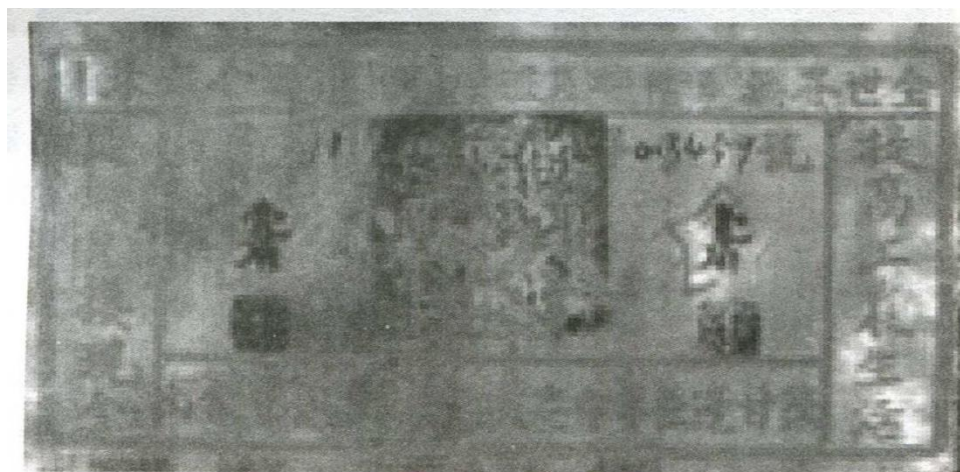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自己动手,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边区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制币厂旧址

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怎么印制货币。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1934年3月末，红四十二师从吴旗县崖窑进入陇东境内的元城川，一天内连打3个胜仗。在高桥没费一枪一弹活捉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及其他4个豪绅。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高明山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极出力献策，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反复实验，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苏币共印制了3000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但是，“苏票”刚开始进入市场流通时，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到集市去时也只观望，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4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发行的壹角油布币

票”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据张策后来回忆：“苏票与银元等值。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

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⑤“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其意义不亚于反“围剿”战斗，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凭着自己的智慧，赢得了胜利，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为了改善边区群众的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刘志丹曾经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⑥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指示，决定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予民生息方针，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除分配一部分给贫苦农民外，还留一部分作为政府、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留下来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①《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30页。

②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③④王西林，高有才，张怀仁：《在南梁的几件事》，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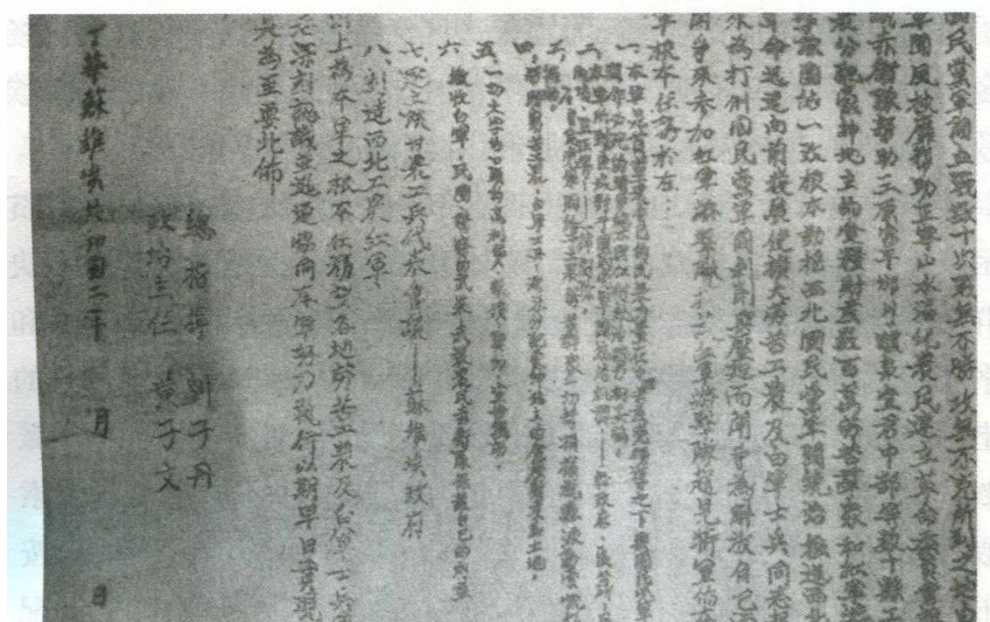
⑤《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30页。

⑥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三、军事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

策，内容包括：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礎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

对红军阵亡战士，不论是正规红军还是赤卫军、少先队，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

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 2000 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大到 3000 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 5000 多人，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高。



陕甘边区青年踊跃参军(绘画)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陕甘边红军兵强马壮，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首先向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曲子新城发起进攻。曲子新城是1932年修筑的。1933年，国民党环县政府由环城南关迁驻曲子新城。城内驻有环县民团100余人，另有环县保安队20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立场反动，处处与红军为敌。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于是，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汇合，红军共有步、骑兵战士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干部和游击队干部一起在悦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



刘志丹编写的《军事教育大纲》残稿

内外一起响枪，不刘志丹编写的《军事教育大纲》残稿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 20 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 60 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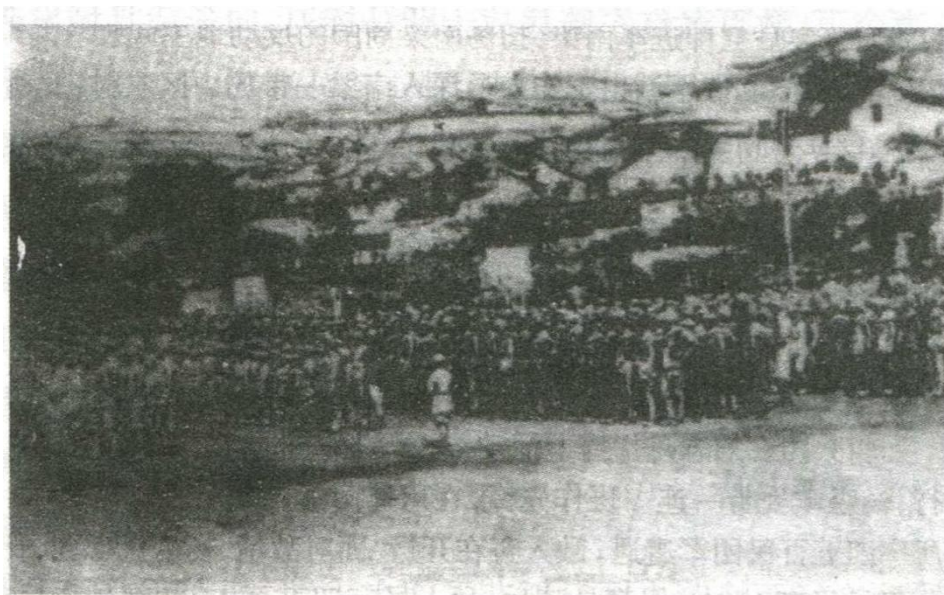
一伤亡。在战斗中，国民党县长见势不妙，化装后仓皇逃遁。敌人的一个顽固反动据点就这样被红军拔除。

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 3 人。并将缴获的一部分粮食和衣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群众见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民团头子和保安队被红军除掉，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块大石块，无不拍手称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会后又把红军在曲子活动的消息传向四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贫苦人民听了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听了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南梁根据地。

接着，红军主力又发起了拔除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的战斗。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这两个据点的敌军经常对庆北苏区进行骚扰，敌军对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穷凶极恶，干尽了坏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11 月 29 日，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包围了五蛟堡和刘坪堡这两个

反动据点。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不敢抵抗，慌忙弃寨而逃。红军乘胜追击，一举将敌军消灭。这样，敌军在庆北境内的反动据点均被消灭。



整装待发的红四十二师

不久，为了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和军需物资，红军主力长途奔袭长武县城。1935年1月，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在获悉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决定化装奇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通塬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装成敌军，然后浩浩荡荡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霎时间，长武城外，烟尘飞扬，战马嘶鸣，杀声动地。敌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军骑兵战士已冲进了长武城内，敌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乱作一团。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敌群，只见子弹呼啸，马刀闪光，红军战士猛杀猛砍，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

团乘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 3 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极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敌交通要道西兰公路，对陕甘两省都产生了强大的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上说，陕甘边区的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晋阳日报》报道说：“共匪刘志丹红军 5 万余人进攻长武。”这说明，曲子战斗和长武战斗对敌人的震动有多大！由于敌人的报纸对陕甘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了西北红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最新消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几次战斗起到了沟通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联系的作用。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1935 年 2 月上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又挺进延安西北的高桥川等地开展游击活动。2 月 12 日，在延安游击队的配合下，诱出延安城守敌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民团 300 余人。在高桥川口，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歼敌 100 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残敌仓皇逃回延安。高桥川战斗后，延安守敌成了惊弓之鸟，被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团团包围起来，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横扫延安周围地区的反动民团，首先歼灭了延安三十里铺民团，接着相继歼灭了临镇、金盆湾、云岩、北池镇等地的反动民团，还迫使后湫天、狗头山两地的民团主动放下武装，接受红军的改编。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还截获敌军的运输队，缴获货物 300 余驮，



1934 年 4 月西华池大捷发生地——西华池镇

西沟畔

敌军新军装 200 余套。骑兵团兵锋所向，势如破竹。

在四十二师骑兵团驰骋疆场的同时，红二十四师第二团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各路游击队，也进军陕北，向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势。1935 年 1 月上旬，在刘志丹亲自率领下，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隆安、平桥等地的反动民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护送刘志丹到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伤势日趋恶化的谢子长。此后，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在南下返回南梁途中，在延安蟠龙镇、榆树峁等地又歼敌数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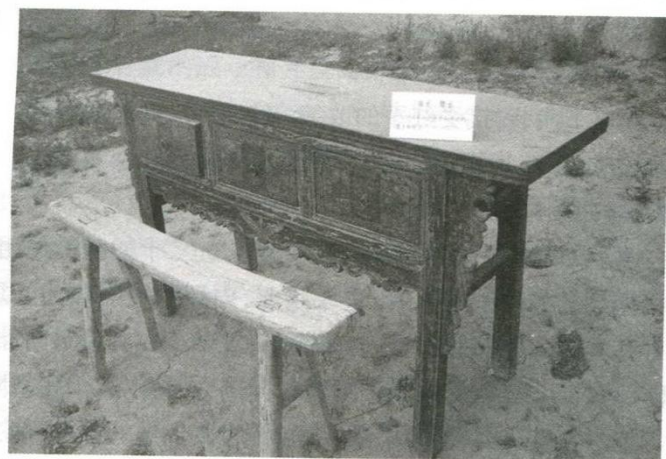
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力支持，开展了积极成功的军事斗争，不仅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影响，也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四、文化教育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主要包括：

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即红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水平。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向根据地人民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的优越性。信任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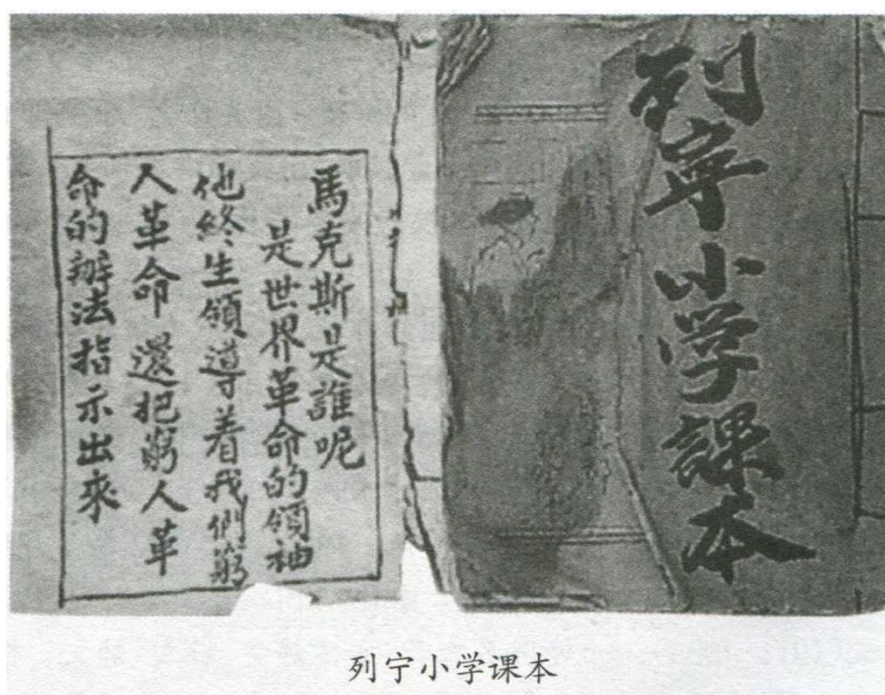
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霍建德、张景文(女)^①任教



列宁小学使用过的桌椅

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教材先用“三字经”，后来自编了油印或手抄的课本。开始编的课本有些空泛，如讲“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一类的话。刘志丹说：“要先讲爱国爱民道理。”他还说：“老先生讲孝道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 j 顿，那就会失去民心。”^② 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在太白、桥扶峪等地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苏维埃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红色西北》。这两个油印小报，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列宁小学课本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政权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1934年10月，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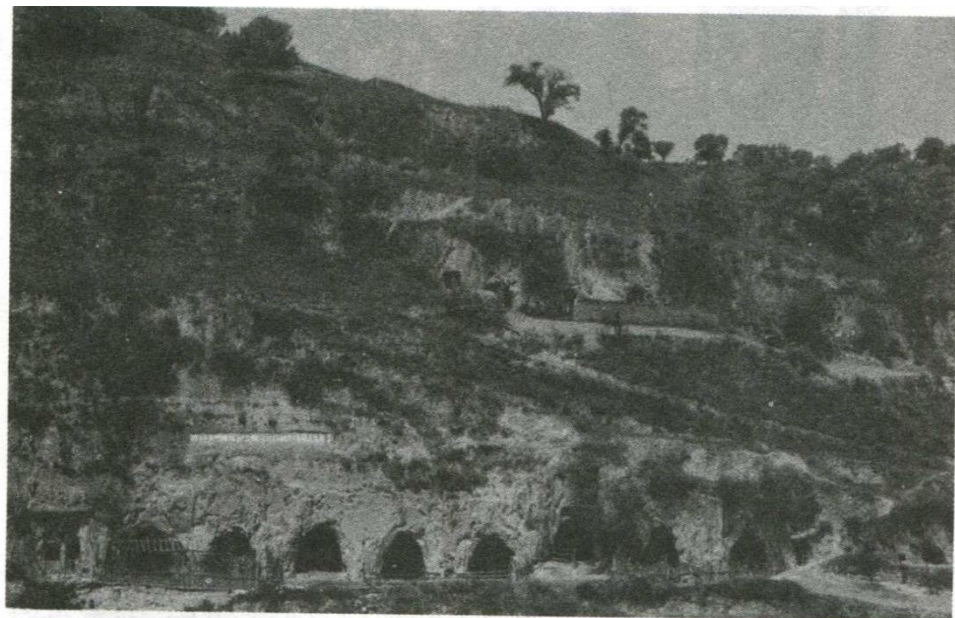
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定”；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扫盲为主。一次，刘志丹正在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从操场走过，刘志丹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话。习仲勋一向把刘志丹当作领导者，论年龄刘志丹比习仲勋长10岁，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从此，20岁的习仲勋更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习仲勋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重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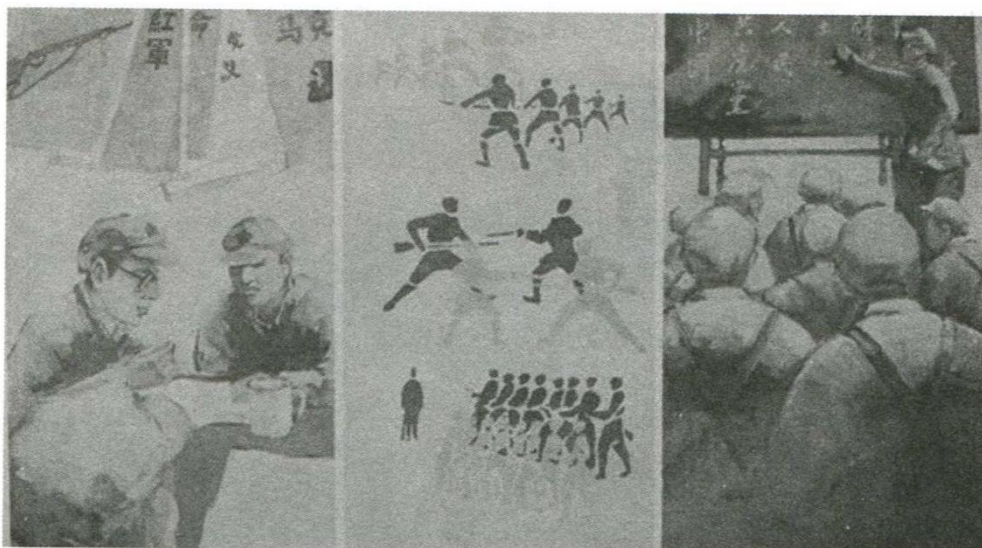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将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党政干部学校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党政干部学校的创

办，提高了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35年7月，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这所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又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即原中央红军



豹子川张岔红军干部学校旧址

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由此可知，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是抗大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③



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场景(绘画)

①霍建德（1911-1963），后化名王俊，一些回忆文章记作贺建德、郝建德。陕西清涧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列宁小学校长、团陕北省委秘书长等，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战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青年部长、西安工委书记、关中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45年4月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敌后武装斗争，曾任陕西工委组织部长，黄龙地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大荔地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9月至1952年7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中共甘肃武威地委书记、武威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年至1959年任兰州炼油厂筹建处主任、兰炼党委书记。1960年至1963年1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1963年1月16日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52岁。

张景文（1911-1935），女，曾用名秀云，亦名静雯、敬文、静文。陕西蓝田人。1932年4月，在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时，曾带领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学潮，被学校开除。1934年春，张景文与丈夫徐国莲奔赴陕甘边苏区，是省女师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女知识分子，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她一面从事妇女教育组织工作，一面担任列宁小学的教员，深受学生和群众的愛戴。1935年九十月间，陕甘边区错误肃反中，张景文被诬陷为白区来的“奸细”而杀害，时年24岁。

②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81页。

③《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员会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五、统一战线政策

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统一战线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最大特色。陕甘边区国民党军阀、民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利用。针对这种复

杂的革命斗争环境，刘志丹等认为：“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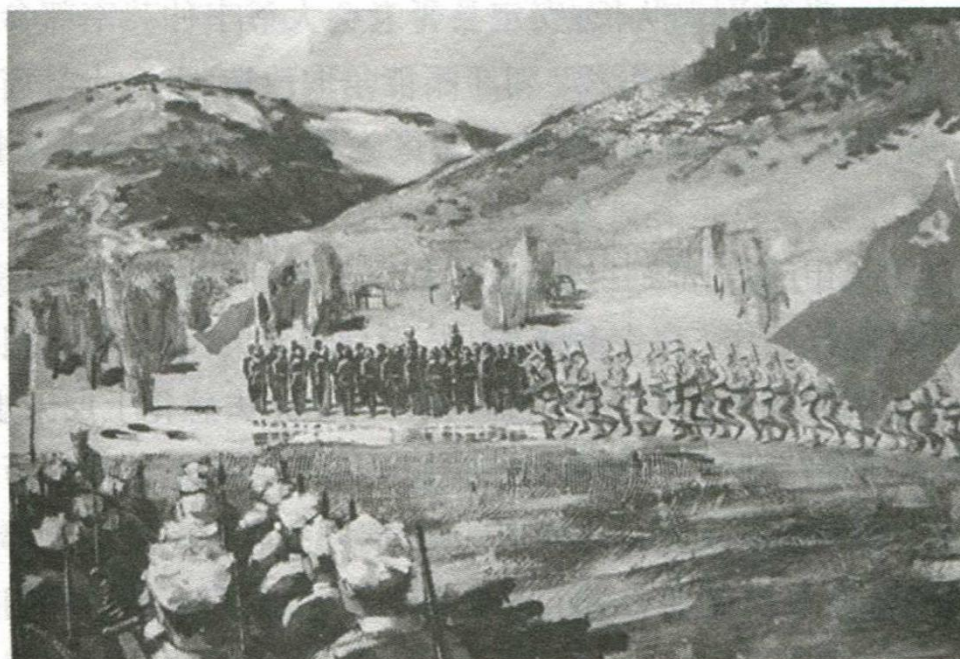
①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策略，在地方军阀、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革命实际的统战工作模式。



黄龙山郭宝珊部起义(绘画)

用“三色”思想创建西北红军。1929年5月，红石峡会议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方针，用红、白、灰“三色”思想创建革命武装，“红”即在农民中发展革命力量，“白”指兵运工作，“灰”即争取土匪、哥老会等。据此，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打入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各色势力，组织领导了七十余次兵变和起义。此后，刘志丹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赵连璧、杨培盛等绿林武装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创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此时部队缺衣少穿，枪支弹药缺乏。为了解决部队的军需供给，决定利用国民党陈珪璋部“借水养鱼”。陈珪璋“拨给游击队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修械工具15驮，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修械工人20余名”

®，使部队度过困难时期，为公开“打红旗”创造了条件。正是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才使西北红军得到了创建和巩固。



红军收编敌匪部队(绘画)

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坚持做好统战工作。陕甘边区党组织十分注重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注意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坚决反对和自觉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等势力，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予以消灭。经过陕甘边党组织不断教育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部郭宝珊营于1934年10月在庆阳新堡(今属华池县)宣布起义，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郭宝珊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追随刘志丹投身革命，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成为新中国司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的副大队长；安定县哥老会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后成为红二十九军军长。对于不能争取改造、群众十分痛恨的张廷芝、杨谋子等土匪武装，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决予以打击、彻底消灭。

更为突出的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十分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十七路

军的统战工作。在十七路军中广泛建立党的组织，教育引导士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①在陕甘边区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感召下，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

陕甘边根据地初期，对民族统战工作极为重视。1933年10月，正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时，就设置了专职统战委员。1935年8月，中共新正县委成立后，在回民地区发展了一批回族党员，建立了回族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回族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等革命组织，实现了有史以来回族同胞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回族地区首先升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党的民族政策不仅在边区内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边区以外的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4年4月下旬，宁县平子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在正宁县南邑胡同伏击了进犯边区的马鸿逵部骑兵连，打死打伤敌人7名，俘虏16名。为了体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游击队将死者送到龙嘴子清真寺，按照伊斯兰宗教仪式进行安葬。又给伤兵和俘虏每人发10块银元，由阿訇蔡登霄负责送往山河镇敌营，在敌人内部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就有国民党士兵携武器向游击队投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对此，习仲勋曾有过客观的评价：“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

很有成效。”

①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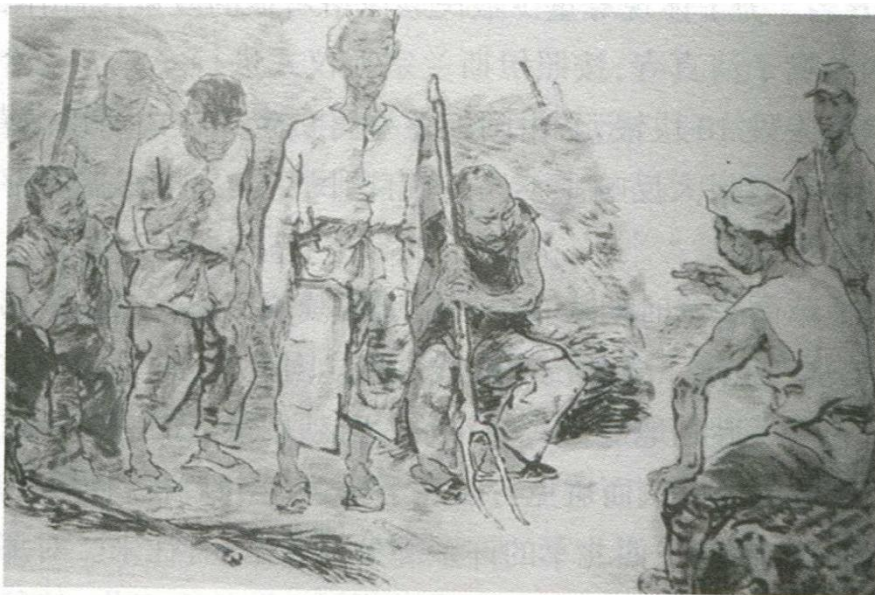
②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3 页。

③《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④《习仲勋文选》编委会编：《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5 页。

六、民政劳资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一些民政劳资方面的政策，比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针对个别雇农好吃懒做的问题，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同时，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为了改造二流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经济上给予帮助，给其分配土地耕种，促其自食其力。同时，着力改变人们歧视二流子的不良习惯。对少数顽固二流子采用强制性措施，强迫其转变。如集体劳动、佩带二流子证章、设立戒烟所、将不生产的二流子编成二流子生产队等。对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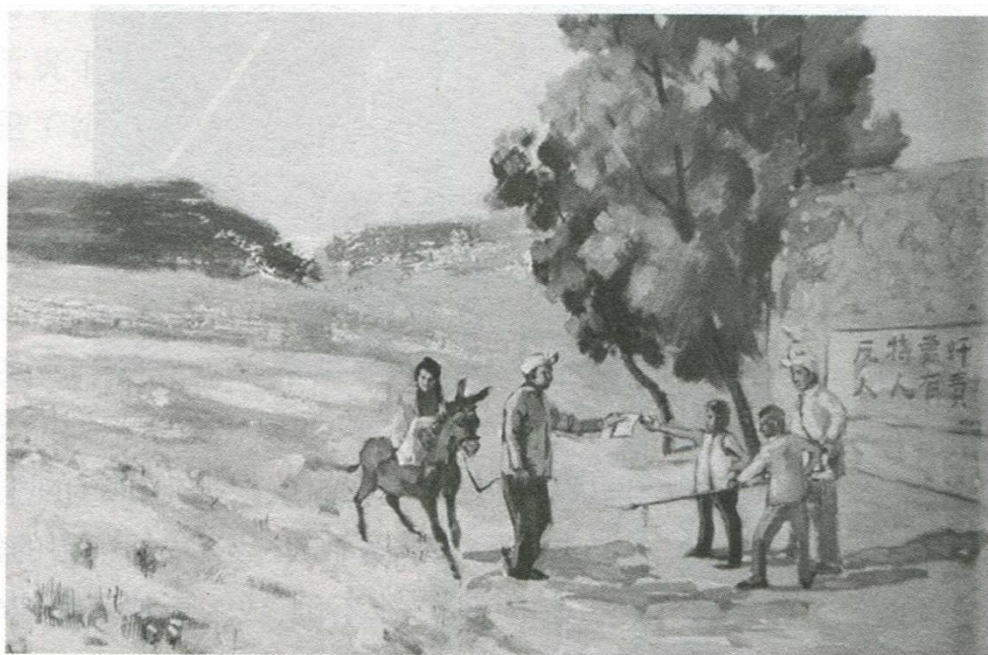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积极争取“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绘画)

七、肃反政策

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肃反工作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明确作出如下的政策规定：

对犯人分主犯与从犯。对属于敌探及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若群众愿出面作保，且不杀也无损于革命的，可以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镇压的政策；一般豪绅地主只向其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处决人犯需经过群众大会，不搞秘密杀人。



陕甘边区少先队员帮助红军肃奸反特(绘画)

八、知识分子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非常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都市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她写得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性格开朗。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她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她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后来担任了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坚持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成功政策的结果。在王明“左”倾错误



列宁小学教员张景文与学生雕塑

统治全党的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识，与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⑥的荒谬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比较，陕甘边根据地红旗不倒，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原因已见分晓。

九、廉政政策

廉政建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 10 块大洋就要枪毙。他又说：“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



《人民日报》刊登的习仲勋回忆文章《难忘的教诲》

那时的 10 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

①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①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8 页。

②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十、社会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俘虏采取优待的政策，比如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

“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造出了非凡的革命业绩，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中心苏区的各项事业取得很大进步，南梁成为贫苦群众向往的好地方。

“ ”

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对陕甘边区实施的“十大政策”进行了重点叙述。^①

（一）土地政策：

在 1932 年我们就开始了土地分配，取得了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有：

-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
- 4、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
-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
-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①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7-260 页。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

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1936年6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和彭德怀、贺龙等转战西北战场，战胜了十倍于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二）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

2、成立牧场，养猪放羊。

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给军队。

4、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

5、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荡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

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

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

（三）军事政策：

1、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的编到红军里去。

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

3、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

4、奖励游击队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

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7、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

（四）对民团政策：

1、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

子新等。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

3、此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①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关系。对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

^①贾德功、梁占魁为黄龙山上的土匪头子,占山为王,各拥有2000多人的兵力。1934年7、8月间,西北军杨虎城第四十二师加紧“围剿”黄龙山区的土匪,以便腾出手来“围剿”陕甘边苏区的红军。双方周旋战斗近半年,各有伤亡。为了避免被围歼,贾德功、梁占魁决定去甘肃接受马鸿逵整编,在整编过程中,由于讨价还价不听指挥,马鸿逵命令冶成章枪毙了贾德功,消灭了其部队,并给予梁占魁部以歼灭性打击。梁占魁深恐自己沦为贾德功第二,带着残部三、四百人突出重围,万不得已投靠了红军,改编为“独立军”,归西北抗日义勇军指挥。梁占魁部投靠红军后,匪性不改,横行霸道,不听指挥,行动不轨,民愤极大。甚至他们还企图说服郭宝珊,把部队拉回黄龙山,重温“山大王”的旧梦。看到郭宝珊不能为其所用,他们预谋杀死郭宝珊,勒持西北抗日义勇军干部、战士离开红军。为此,按照陕甘边区军委指示,郭宝珊抓捕处决了梁占魁等首恶分子,撤消了“独立军”的番号和建制,遣散了100多名品质不好或不愿革命的人员,挑选了200多名表现较好、愿意留下来的干部、战士到西北抗日义勇军里继续工作。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

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

2、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或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胃。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保证了战略计划的实现。

(一)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主要内容是：第一，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住宅等财产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分给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第二，土地和青苗一齐分配，以满足农民的迫切要求，调动农民斗争的积极性。第三，红军家属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白军士兵暂不分给土地。第四，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回忆我的红军生涯》，1993年2月编印，第282-285页。

王世泰(1910-2008)，陕西省洛川县人。曾任陕甘游击队二中队班长，红二十六军第二、第三团团团长，陕西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等职。抗战时期曾任庆环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警三旅政委兼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和关中警备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四军军长、一野第二兵团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行署主任，甘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计委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二)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活跃根据地的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苏区中心华池县荔园堡，开设了陕甘边区第一个由革命政权创办的集市，为根据地群众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对白区的商人，政府采取欢迎、争取和保护的政策。为了促进苏区经济

的发展,加强金融管理,稳定物价,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一元苏币兑换一块银元,在国民党货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苏币却很稳定,在商人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吸引了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同一些开明商人建立了贸易关系。

(三)加强军事建设。根据地内实行自愿兵役制。凡是参加红军的群众,必须在游击队经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然后编入红军正规部队;武器弹药主要是向敌人夺取,但在中心苏区也建立了兵工厂。同时鼓励群众买武器,凡买到武器者,给予奖励,买到新式武器,则给予特别奖励。苏区还普遍建立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组织;设立民间递步哨,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对阵亡战士,无论是正规红军还是游击队员、赤卫军,均发给抚恤费。

除继续办好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外,陕甘边区军委还为红二十六军制定了“暂行条令十八条”。边区政府制定了“凡党、政、军干部,如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的法令。这些法规的实行,受到了群众的热情称赞。

(四)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首先,政府在中心苏区华池县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政府为学生编印的课本内容新颖,通俗易懂,既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政府为了扫除文盲,还办起了成人识字班。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陋俗恶习、移风易俗的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使根据地的政治思想、精神面貌、社情民俗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宣传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

(五)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边区政府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和群众痛恨的惯匪,坚决实行镇压;对一般占山为王、劫富济贫的,则采取一切办法进行争取和改造他们。对民团也同样区别对待,对同情革命、靠近红军的,则与他们建立联合关系,互不侵犯;对投靠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民团,则坚决消灭;对那些持中立态度的民团,则采取政治宣

传，进行分化瓦解。对会道门组织，主要采取争取的政策，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了几项工作：一、在南梁荔园堡设立集市，促进了当地的商品交换，改善了群众生活。二、发行货币。在木板上刻成版后，以布代纸拓印，然后用油一涂，即成苏区货币，与当时的银元等价。由于当时粮食便宜，商品经济不发达，这种货币发行量不大。三、在荔园堡附近动员了四五十个小孩，建立了列宁小学，使这个地方第一次有了学校，影响很大。

①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402页。

张策(1911-1999)，曾用名王尚义，陕西省高陵县人。曾任中共高陵县特支书记、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科长、经理处长等职。1933年10月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特派员的身份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曾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泰安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陕甘省委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长、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委委员兼蒲城中心县委书记等职。抗战时期主要在冀南区竞委工作，曾任民运部长、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东北工作，曾任嫩江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东蒙工委书记，兴安省副主席、军分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骑兵纵队政治委员，吉林省委常委、吉南地委书记兼吉南军分区政委，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等职。

当时，在军需给养的负担上也是有阶级政策的。革命政府和红军的给养主要放在地主和富农身上，对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土地要彻底没收，一是留给红军作给养；二是分配给贫苦群众。但还给地主一份土地，使他们自耕自给，对于富农只没收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废除他

们所放的高利贷，没收他们出租的土地和出租放养的牛羊。政府干部和红军在地主家里吃饭是不付钱的，而对于中农、贫农则是秋毫无犯，在中农、贫农家里吃粮吃菜和烧柴都要从优付钱。实行这种政策，影响很大。凡是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和干部活动的地方，广大群众都是安心的，对我们毫无恐惧的表现。只有地主豪绅、恶霸非常惧怕我们，因为我们不仅要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而且对民愤很大的一方之霸还要杀头。这就是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情况。

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土地法》。这个文件现在可能找不到了。总的精神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那时候我们边区没有资本家，只有地主、富农，所以，对地主没收其土地财产。土地不是全部没收，留给一份坏地，让他自食其力。对富农主要是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如高利贷等)和多余的土地。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土地政策。

①刘景范：《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

刘景范(1910-1990)，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系刘志丹胞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甘游击队班长、中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保安游击队队长、陕甘第二路游击大队二支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志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部长、陕甘宁省委书记等职。抗战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尹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央西北局委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西北野战军前委常委、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中顾委委员等职。

地广人稀，是陕甘边地区的一个特点。这有一个历史的原因。早在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波及到这个地方。之后，西捻军，从山西过河到了陕北、陕甘边，占了很多地方。加之，后来的军阀割据，土匪称霸，使这个地方长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所以，造成了人少地多的现象。因而当时老百姓对土地的要求并不很迫切，最迫切的是废除债务、分配财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打土豪时，首先是废除债务，烧毁契

约。其次是分配粮食、牛、羊等牲畜财物。土地分配进行的较晚一些。

1934 年夏天，在华池县开始进行土地分配。年底又在赤安、甘泉、合水等县进行了土地分配试点。到 1935 年春（除游击区外），大部分地区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例如，甘泉县的土地分配搞的比较好，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牲畜、粮食，但还给地主留有一点土地，自己劳动生产食用；富农仅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其余部分一般不作分配；中农一概不动。到六七月间，陕北派了个工作组，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本来不是地主的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分配了。这样，我们看不行，特委开会把“查田运动”停止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才得到了健康发展。

苏币发行^①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们在荔园堡设了集市，群众很欢迎。也印发了苏票，苏票是财政委员会制发的。财政委员会是杨玉亭负责，印苏票的是李登瀛。苏票是用白洋布油印成蓝色的，印成后用桐油一油。印有壹元，还有几角的。李登瀛当时是共青主任。

①《吴岱峰 1985 年 5 月 13 日谈苏币发行》，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5 页。

吴也峰(1903-200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支部委员和副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红二十六军代理团长，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游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副校长，红二十九军军长，_央红军北路军参谋长。1937 年后任中共陕北西区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教导学校校长、八路军警备三旅政委(副旅长)、中共三边地委常委，八路军陕甘宁晋线联防军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绥德警备区独立第一旅旅长兼党委书记、榆林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1949 年 9 月后历任第十九兵团党委常委、陕北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西北分署检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监委委员会委员、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组部八处党支部副书记等职，是中组部正部长级离休干部。

红军干部学校^①

从 1931 年到 1935 年，陕甘边先后办过以下军事学校：一、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1931 年冬由西北反帝同盟军党组织办起，反帝同盟军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后，训练队改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队长张 XX（留苏学生，现在内蒙工作，北京市委刘仁同志了解）。分两个班次，高级班，训练排长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与优秀战士。课程有游击队怎样活动等，主要是讨论部队的改编问题。训练队设在正宁县的三嘉原。1932 年春结束。二、红二十

六军二团随营学校。1933年春，创办于照金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学校也垮了。三、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学校成立于1934年春，是刘志丹同志办的。志丹同志鉴于部队扩大，就吸收了许多农民参加，他们的军事知识太差，急待训练，于是办了 this 军事学校，来提高整个红军的质量。刘志丹同志兼任校长，吴岱峰同志任军事主任，校址设荔园堡。1934年春到1935年春，共办3期，对象都是排连级干部。第一期30多个学员，学习1个多月；第二期70多个学员，学习70来天；第三期3个月，100多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曾停办一个时期。二、三期是连接办的，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议（十大决议，革命性质等）”。军事课有“制式训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等等。除训练干部外，还附带训练了10多个县长，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中工作。

①《吴岱峰1959年5月21日谈红军干部学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政权建设^①

(一)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推动了政权建设，同时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而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崭新局面又给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雄厚基础。

分配土地。1928年，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南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中央土地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特点进行的。当时，我们拟定了一些具体条例，大体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些人口少荒地多的地区，给地主分了些坏地，使其生活有出路)；给富农留少量的土地，以够其吃用为限；团结中农进行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地少地农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

①《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7年版，第625-631页。

蔡子伟(1908-1990)，原名建勋，陕西省蓝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代理部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代理厅长，陕甘宁边区中学校长，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副部长，农林部顾问，第六届全国政协农业组组长，全国农村经济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曾发生过一点儿曲折。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县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已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

工剥削。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疲疲沓沓。当我们批评他为什么迟迟不抓运动的时候，他却说什么“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我们说：“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后来经研究决定，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以示处分和教育。任命李生华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开小差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年纪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检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时天黑了，我们就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烂的窑洞里。到了吃饭时间就在老百姓家吃。就这样，走东村，串西村，工作有了较大开展。

分地时，我们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像玉皇庙川、白马庙、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了阶级成份。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份很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我们也有个别错定成份的现象，经群众提出，很快就纠正了。

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区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如梁占魁、贾德功等惯匪在当地盘踞几十年，把群众害苦了，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条毡都卷走。那时，每当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

粮食政策。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

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首先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每隔3天一次（有说10天一集）。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饴饴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 and 边区经济建设、市场稳定，我们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货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那时候，没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相互帮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及时地给我送来了一套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们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不仅从军事上对我们实行“围剿”，还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封锁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针锋相对，采取有效办法对付他

们，从而不仅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而且活跃了边区经济，保证了物质供给，支持革命战争。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办法是拉豪绅。我们经常组织小股精干力量，瞅机会打入白区，神出鬼没，抓住地主豪绅等便拉回根据地来。拉来后向他们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议价”；或者是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他们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儿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有的杀掉，有的要实行劳动改造，叫他们背柴、挖窑洞。记得有一次杨森带领的骑兵曾在白区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钱财，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这次行动很成功，在政治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了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

第二种办法是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白区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们把边区的羊子等廉价卖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很高兴，便愿意跟我们做买卖。我们就叫他们给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给我们送来。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

此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

第三种办法是发展边区生产，壮大经济力量。

(二)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1934年，在陕甘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光荣诞生了。这所干校的规模虽不算大，但在陕甘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贵在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的豹子川。这里森林茂密，时常能见到狼和狐狸等野兽，各种鸟类争鸣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

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坑。当时，召开了成立大会，搞了个很简单的成立仪式。红军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马文瑞和我都是教员。不论校长、政委以及教员都是兼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军事素质和增加游击战争常识等。军事课由刘志丹担任。因为学员文化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马文瑞、吴岱峰和我也不断在这里讲课。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儿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干校每期学员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约共办了3期。

在文化工作方面，边区曾创办了列宁小学。第一个列宁小学在何家沟门办起来的，课堂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教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敬文（女，后来在“左”倾路线的“肃反”中牺牲了），另一个是贺建德^①。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因为我是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长，审编教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曾采用诗歌的语言编写过一些政治教材，记得有一首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此外，为了消灭文盲，我们还在一些村子里办起了成年人的识字班。

另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叫《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是龚逢春。政府的公开刊物叫《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最多，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文件均在本刊发表。这个刊物版面不大，相当现在的8开纸，用的是质地较好的有光纸，因为条件所限，印刷是油印的，印油分为红、蓝、黑3色。刻蜡板的主要是席德仁，字迹工整漂亮。

①贺建德即霍建德，张敬文即张景文。

(三)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刚到陕甘边苏区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几位负责同志正在阎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开会。志丹一见到我，马上亲热地说：欢迎，欢迎。他中等个子，眼睛机警有神，脸庞有个大黑痣，下颚上长了几根胡须。他身着坎肩，打着绑腿，腰里挎着盒子枪。志丹住过黄埔军校，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继而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带刘景范来到桥山山区。

志丹很会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的关系，安塞、保安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对于土匪，我们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魁和史老么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梁占魁作恶多端，不可争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国民党，后又拉了出来，在路过二将川时，我们打算争取他，但史诡诈得很，怕红军力量大，会吃掉他，跑掉了。郭宝珊部，在我们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我们派任浪花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遣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革命的同志。

团结改造哥老会，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又一方面。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种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

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指挥。

此外，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尤其是刘志丹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做对方的工作。

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政策^①

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我们没有银行，苏票是财经委员会印发的，苏票是细白洋布印的，用木头刻个方形章子，用篮颜色印在白布上面，有壹角、贰角、伍角几种，中间有个镰刀斧头，最后用桐油一油。那时候苏票价值很高，群众乐意用银元兑换（没有苏票买不到苏区的东西）。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

^①《蔡子伟 1985 年 5 月 8 日谈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5-486 页。

“

”

陕甘边苏区党政军建设^①

陕甘边区党的领导机关是特委，书记惠子俊，宣传部长龚逢春，组织部长蔡子伟，军事部长刘志丹，常委会常委有习仲勋、刘志丹、龚逢春、蔡子伟、惠子俊等。特委机关设在南梁堡子。1933年在薛家寨时，书记是习仲勋。退到南梁后，习仲勋做了地方工作，直到南梁政府成立后才恢复了特委。

我是1934年农历九月初到南梁的。我到之前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政府设有执行委员会，委员都是执行委员，我十月开始担任秘书长。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军委工作人员有马锡五(保管)、杨载泉(秘书)等。

①《张文华1979年11月1日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建设》，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437页。

张文华，陕西省渭南人，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陕北特委书记、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兼职教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等职。离休前曾任陕西师大政教系讲师。

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是蔡子伟起草，1934年腊月的特委、省苏维埃政府的会议上通过。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区分富裕中农，不与富农混淆，反对富农，消灭地主（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分配土地”，“划分成份，先由贫农团通过，再经全体农民大会通过，再分土地”。这参照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起草的。

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可惜由于宁马部队“围剿”，未能完全实现。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只有1个团（叫老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汪锋。杜衡指示南下，在洛南失败后，基本是全军覆没。在照金地区，耀县地下党组织起义，王泰吉骑兵团起义，还有李妙斋的游击队，在陈家坡会议上，对部队进行了集中统一。把李妙斋游击队、耀县陈学鼎游击队组成了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成立了义勇军，王泰吉为司令员。在这之前将渭北游击队改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刘映胜（后为杨森）。新的红二团是以后成立的。1935年在关中成立了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后为郭炳坤）。红一团成立初是2个连，三路游击指挥部的特务队为一连，连长张治怀。第二连连长姓马（胡宗南部杨步飞的六十一师手枪连班长，是兵变过来的。这个手枪连驻在宁县，9个班长打死了连长，起义投诚变过来的。最早是十九路军部队）。郭宝珊原在黄龙山土匪梁占奎、贾德功部下当营长。这股土匪经杨虎城秘书杜斌丞做工作，准备收编为驻西峰的杨志恒师为一个团，路经合水时，我方派人慰劳。这股土匪到西峰，杨志恒师已撤走，无人发军饷，供军粮，给养困难，经过商议，叫郭宝珊假称兵变，到宁夏一带搞粮饷。1935年2月，路经城壕川通过我们做工作，同时有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全部缴械，缴枪300条，成立义勇军。

列宁小学^①

据我所了解，继第一所列宁小学成立后不久，在合水的太白(当时属华池管辖)也建立了1所列宁小学。有20多个学生，1个教师叫张仁杰。还在荔园堡川口建立了1所，有学生10多个。具体建校时间和教师已记不清了。

①张文华1985年4月30日谈列宁小学》，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1933年，刘志丹率领红军到南梁，消灭了荔园堡梁邦栋部，随即开展地方工作。当时，刘志丹、王世泰，杨森等同志做军队工作，习仲勋、张策等同志做地方工作。红军初来时，白天深入群众中开会宣传，晚上就走了。第二年政府成立后，这里的工作就大大开展起来。政府机关驻南梁寨子湾，粮食科长杨玉亭，医院院长马锡五。

这一带开展初期，参加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的人很多，每区每村都有赤卫军组织，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加，有些老人也参加了。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指挥郑子林。红军军纪严明，威信很高，群众主动要求参军，当了红军的不少。少先队也组织起来了，少年儿童按自然村编为小队，荔园堡3个队员，我任少先队主席。少先队受赤卫军领导，任务主要是开会和斗争豪绅。赤卫队活动很活跃，对保卫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赤卫队曾配合游击队打过旦八寨子，将地主的白羊赶回一群。还配合红军守卫老爷岭一线。我们这个队共100多人，9支枪，每隔两三天，夜间就去骚扰敌人1次，使他们不能安稳休息。

①《王生金1959年4月21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427页。

王生金，华池县荔园堡人，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委员长。

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即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组织贫农团，开始了土地斗争。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数人(区设四五人)。我曾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农会，就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斗争。这里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庆阳恒义成、裕茂隆(皆为商号)所有，再加上当地的地主，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荔园堡张清玉是个破产地主，但也有川地200多亩，山地2000多亩，粮食几十石。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份，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全分的是好地，然后再按成份给其他缺少地的农户分配。这里的土地广，每人可分川地10亩。我家5口人，共分川地50亩，山地约有100多亩。对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他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给在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给分地。1935年春，由于这里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这时，给当地地主张清玉才分了一些坏地和烂窑。

土地改革后，政府领导群众主要抓粮食生产和牲畜牧养。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100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

为了便利群众进行物资交流，开展贸易往来，政府发行了油布币。荔园堡建立了集市，苏币面额有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五角3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禁止流通。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采取欢迎态度。他们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3集，逢一(即

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兰、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兰布做的鞋，每双1块白洋。

在荔园堡成立了干部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吴岱峰、蔡子伟等同志任教员，学员约200余人。在转咀子成立了列宁小学，学生近60人，男教员郝建德，女教员张芳馨^①。在群众中还进行了反对吸大烟，禁止赌博，提倡放足的宣传。

^①郝建德即霍建德；张芳馨即张景文。

1934 年秋天，在荔园堡成立军事干部学校，我是第一期学员。这一期还有边德荣、马志英、康健民等。10 月 1 日开学，28 个学员，学习了 28 天，因为要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前结束了，我们都当招待员、办事员去了。志丹对我说：“你的腿受过伤，跑不动，把我的马骑上当通讯员。”当时我们的军衣是群众用绿草水染的，人说红军成了绿军了。

①《宋飞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红军干部学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5 页。

宋飞（1908-1998），陕西省淳化县人，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9 年 4 月任中共咸阳地委常委、咸阳军分区司令员。1952 年 6 月后，转入地方工作。

红二十六军干校的建立及活动情况。1934年在蒸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这时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也成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在这种陕甘边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政府开始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干校开始设在荔园堡一座破庙里，住3月余后迁到豹子川。校长刘志丹兼任，具体管理办学的是副校长吴岱峰，教员马文瑞、蔡子伟。当时一切都很简单，没有教室，学员动手挖了8孔窑洞，在里面学习、住宿。学习的科目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作战战术；南方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情况；游击战争的战术以及苏维埃选举法；分配土地等。学员没有课本，每人发10张麻纸，1支铅笔。上课时，老师讲，学生记（多数学员不识字，不会作记录）。刘志丹也亲自讲过几次游击战术的课。学员来源主要是部队中的基层干部和开展苏区工作的积极分子。我当时是骑兵团的排长，参加了第一期学习。第一期学员60多名。

时间每期3个月，共办了3期，1935年肃反开始就停办了。这所干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陕甘边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是我们党在陕甘边创办的第一所军政学校，对于培养提高广大军政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①《杨伯伦1982年11月来信叙述红军干部学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488页。

杨伯伦（1902-1993），陕西省乾县人。1932年参加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南路指挥部政委，中共关中特委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新正、新宁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分委组织部长，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长兼新正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专署副专员，中共西府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代书记，中共彬县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政法委副主任、监察厅厅长，中共陕西省监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陕西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1983年离休。

1933年农历11月，荔园堡一带开始组织村政权。其方法是按村召集贫苦农民开会，秘密选举村主席。我被选为南梁村主席，主要任务是召集群众开会，侦察敌情，向红军报告消息。12月，开始组织赤卫军。小河沟共八九十人，编为1个大队。当时根据地包括豹子川、小河沟、二将川等地，活动区域北至慕家沟，南至葫芦河，西至老爷岭，东至平定川，长宽各近百里。

1934年农历2月，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回师南梁。志丹将9个大队的赤卫军和群众集合起来，在荔园堡开了四五千人的大会。赤卫军拿着红缨枪和大刀，看起来很威风，志丹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红军、游击队、赤卫队打张廷芝和张廷祥。他说：红军前边打，你们赤卫军后边来，分他(张廷芝)的牛羊，抄他的家。你们拿的红缨枪不塌火，一刺一个敌人。大会开了3天，杀了许多羊，大吃了3天。会后，红军和赤卫军即到脚乍川与张廷芝打了一仗，将张打败。红军遂将九嘴坡同家(志丹岳父家)、瓦子川胡新庄胡家等大豪绅拉走。

①《高生荣1959年4月22日、23日谈苏区创建》，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20页。

高生荣(1904-1980)，甘肃省华池县林银人。1934年2月当选为小河沟村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任陕甘边区华池县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任安塞县延家湾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任华池战区主席。后曾任华池县白马区区长和白马区五乡、八乡党支部书记。1949年底回家务农。1980年因病去世。

农历8月，在荔园堡召开代表会，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还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赤卫军指挥部。习仲勋同志任政府主席，贾生秀、白天章任副主席^①，边金山任肃反委员长，朱志清、郑德明任正副总指挥。这时，赤卫军已有13个大队。根据地已发展到北至吴堡川、义正川，南至和尚原，东至平定川，西至柔远东沟、城壕川，长宽各约一百七十八里。成立了华池县，共分为9个区，区下设村。区有区主席、劳动委员、土地委员等，村有村主席。

这样从省到村的革命政权全部建立起来后，随即开始分配土地。对地主豪绅的财产全部没收分配，如对白马庙郭万城、豹子川杨庄科薛万铭等小地主，给他们什么也不分，撵上山去吃草，后经地主哀求，才允许给政府做活。对富农的牛羊全部分掉，对多余的土地（按人口计算超过当地每人平均数的土地）也分掉，对招“门客”伙种庄稼的地也分。按人口平均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入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大队队长郭锡山，下辖2个中队。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恶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樊川李家因乡行较好获释），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

省政府刚一成立，为了便于群众交易，就在荔园堡成立了集市，逢一有集，每月3集，对白区商人采取欢迎的政策，保护他们利益，使他们有利可图，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

^①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恢复成立时，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

1934年农历3月，仇良民的军队1000多人，并带有太白民团20余人，从合水、太白、二将川一线进犯南梁根据地。仇军在这里住下后，将小河沟、白马庙、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尽皆烧毁，窑洞全部破坏，粮食烧光，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仅在老庄河一地就烧掉粮食10余石，麻材1窑，打锅3个，群众都被迫钻了梢山，其残酷程度是空前的。仇军住了6天后，从白马庙川北上，到保安县，挖了志丹家的祖坟，又从洛河川下去，经张村驿回到合水。

1935年春，马步芳以10团之众，分3路“围剿”南梁根据地。一路从城壕川、太阳坡，一路从柔远东沟，一路从二将川三里畔一带向苏区进犯。敌人在太阳坡一带受到阻击，在那里滞留40多天，后探知红军不多（主力红军北上安定），遂大举进入苏区。苏维埃政府迁至洛河川，习仲勋同志率保卫队到瓦子川，被马家军追上，打了一仗，习带一部分人转到房家湾。当时群众为了反抗敌人的围剿，就将粮食等东西坚壁清野，将牛羊赶入梢林，青壮年男女群众皆躲入梢林。马家军到根据地后，即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放火烧山，迫使大部分群众赶上牛羊回来。敌人在寨子湾驻了3天，搜了3天山，企图捕获我革命干部。敌人为了破坏根据地，不准群众在南梁、小河沟、豹子川一带居住，强迫那里的群众移民并村，将那一带的群众家舍全部毁坏，门窗被挖光，炕被打掉，牛羊全部赶至庆阳三十里铺。

同年4月，就在马家军进犯南梁根据地后1月多时间，红军主力在安塞李家塌经3天战斗，打下了寨子，接着打下了兴隆寨，红军又北上至安定。当时，我到延家湾，任区苏主席，不几天，即到安塞工作。

6月20日前后，在林岢沟进行阅兵。参加阅兵的除红军外，还有8个游击支队和赤卫军1万余人。

9月，每县选几十名代表，到永坪参加会议，选举和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会议开了3天，以后接着成立了干部党校。这时，红廿五军从白豹川、洛河川到永坪和红廿六军会师。会师后，经过劳山战斗，红军主力回到洛河川休整。不几天，又去打瓦窑堡，敌人被吓跑了。

这时，陕北根据地大大地发展和扩大了。

此时，马家军退出南梁根据地，成立华池战区，我任主席，崔凤鸣任书记。当时，群众生活很苦，秋田没有按时种上，粮食全被敌人吃光，就靠野菜度日。为了开展工作，即组织游击队，从红军部队中领回枪枝 23 条，成立了三路游击队。这时，东北军驻在太白镇一带，马家军尚在庆阳卅里铺等地，但南梁根据地却发展到南至东华池，北至志丹，西至木瓜岭、麻子岵岷、吉胡坪，长宽各约 300 余里了。

11 月，东北军一小部来“围剿”，被游击队击退，俘敌数人送至洛河川。

腊月，游击队在合水北川麻子岵岷袭击敌人运输队，缴获马 4 匹，洋面数百斤。

列宁小学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成立的，开始在九眼泉 3 个石窑洞里设立，以后搬到转嘴子。11 月 7 日，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列宁小学学生还参加会了，大一点的学生拿着红缨枪，在戏台前还表演来。

①《王四海 1986 年 11 月 6 日谈列宁小学》，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5 页。

王四海（1917-2005）即王泗海，陕西省志丹县人。1934 年 4 月参加革命。193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保安游击队战士、红二团排长，赤安县军事部副部长、部长，赤安县保安大队代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陕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榆林军分区副政委兼独立二师副政委，宝鸡军分区副政委、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正军职离休干部等职。1960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为了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成立 80 周年，学习研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功执政经验，继承弘扬南梁精神，按照甘肃省副省长、中共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同志的指示，市委党史办编纂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一书。

该书是一本普及性党史宣传读本。通过聚焦南梁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十大政策”，以及所带来的陕甘边根据地特别是南梁中心苏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管窥南梁政府的伟大建树和代表性成就，揭示南梁政府的决策者们自觉克服“左”右倾错误思想樊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制定出符合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深受广大劳苦大众拥护欢迎的方针政策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眼光，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必然性。在具体编排中，通过“十大政策”概述、基本内容和回忆文章三个部分，对“十大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对其历史背景、制定过程、基本内容、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作了系统阐述，目的是帮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和认识“南梁政府”的光辉历史，认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该书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庆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副省长、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副书记、市长栾克军，市委副书任燕顺，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副巡视员李荣珍，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汪晓军等亲自审读书稿，

提出重要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改进内容、顺利出版大有裨益。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资料收集整理困难，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纰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 年 7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中共庆
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98-2707-9

I. ①陕… II. ①中…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方
针政策-研究 IV. ①K269.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979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鸽子 李晓雨(特邀)

复 审:陈海平

终 审:汪晓军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甘肃省庆阳市亨科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1/16 170mm×240mm

字 数:70 千字

印 张:6.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707-9

定 价:18.00 元

SHANGANBIANQUSUWEIAIZHENGFU

著名的“十大政策”



ISBN 978-7-5098-2707-9



9 787509 827079 >

定价：18.00元